

余英時·著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

余英時・著

69·8·0414

·60006·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 古代篇

著者 余英時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電話：七六〇一六—二三一七

郵撥：一〇〇五五九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一三〇號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再版

定價：平裝本二五〇元
精裝本三〇〇元

自序

這裏收集了四篇關於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的研究論文。這四篇文字並不是一氣呵成的，撰寫的時間先後相去二十餘年。

第一篇「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成於一九七八年一月，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編的《中國上古史》中的一章。初稿曾刊於《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一九七八年七月）。第二篇「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撰寫得最早，刊於《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五六年二月出版）。第三篇「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約九萬字，是全書中最長的一章，刊於《新亞學報》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五九年八月）。最後一篇「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轉變」則是最近寫成的，發表於《食貨月刊》復刊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這次彙集成書，多篇均經修訂增刪，但基本論旨並無改變。

本書雖非根據一預定計劃而撰寫，但各篇之間多少存在著內在的聯繫。二十多年來，知識份子的問題一直是我個人治史生涯中的一個重點。因此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性格之形成及其流變便自然而然地構成了本書的中心系統。以研究的取徑而言，各篇大抵都偏重在社會史與思想史方

面，尤着眼於兩者之間交光互影的所在。知識份子的主觀憑藉在思想與學術，其客觀功能則與社會結構密不可分。祇有主客兼攝才能使我們確切地把握到中國知識份子的傳統特性之所在。

必須說明，本書並不是一部綜合性通論，所收各篇都是對每一時代最具關鍵性的問題作多方面的分析，以期凸顯中國知識份子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表現的個別風貌。全書上起春秋戰國，即知識階層的形成期，中論漢代，是知識階層的定型期，下迄魏晉，則為知識階層的轉變期。現在讓我對這一概略的分期稍作說明。

所謂形成期，是指周代封建秩序解體之後，知識份子從古代那種嚴格的身份制度中游離了出來，形成一具有社會自覺的階層。整體地說，這一階層已成為文化傳統的承擔者，但其中個別份子的社會位分則仍具有高度的流動性。知識份子在當時就稱「游士」確是十分恰當的。

知識階層的第一次社會定型發生在秦漢時期。隨着統一帝國的出現，知識階層在新的社會結構中逐漸取得了明確而穩定的地位。一般而言，這一階層在經濟方面趨向恆產化，在社會方面走上宗族化，在政治方面則通過鄉舉里選的制度而建立了正規的入仕途徑。知識份子不再是「游士」，他們已成為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的所謂「士大夫」了。不遲不早地，「士大夫」恰好在兩漢之際逐漸演變為知識份子的社會專稱，這是很值得注目的現象。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時代；以知識階層的歷史發展而言，尤其是如此。從社會史的觀點看，知識份子在這個時代已成為最有勢力的特權階級；其中所謂高門不但壟斷了知識，並且也獨占了重要的仕途。這是兩漢以來知識階層定型以後的一種自然的發展；恆產化導致

大莊園的興起，宗族化衍生了門第制度，鄉里選變爲九品中正，家學的遠源則在漢代的累世傳經。極其所至，終於造成了一個所謂「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時代。

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觀察，知識階層在這三個歷史階段中也各有不同的精神面貌，但個別份子所表現的理想主義的傾向却並不必然是他們的社會地位所能完全限定的。因此社會發展與思想發展之間儘管息息相關，然而却不是吻合無間的。我們必須分別以觀。

中國知識階層自春秋戰國初出現於歷史舞台之時即已發展了一種羣體的自覺，而以文化傳統的承先與啓後自任。這就是當時思想家所說的「道」。從此以後，「道」不但是中國知識份子批判現實的根本依據，而且也成爲中國思想史上各種理想主義的托身之所。故所謂「道尊於勢」或「道統高於政統」的觀念早在孔子的時代便已呼之欲出了。到了漢代，董仲舒一方面論「道」，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另一方面論朝代興替，則強調「五德終始」。兩相對照，「道統」之當凌駕乎「政統」之上，是顯而易見的。兩漢奏議最爲古今傳誦，其中不少正是知識份子持「道」論「政」的具體表現。

在漢代統一帝國的格局之下，知識份子所最關懷的基本上是怎樣建立並維持一種合理的羣體秩序。但隨着漢末政治社會危機的加深，知識份子在精神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思想史的總趨勢來說，這一變化是由外馳而轉向內斂。漢晉之際的知識份子對以前有關羣體秩序的一切思想無不一一重加評估。這種敢於懷疑一切流行價值與觀念的批判精神充分地說明知識份子在個體自覺方面已發展到了十分成熟的境界。比較而言，如果說漢代儒生的持「道」論「政」尚是站在知

識階層的共同立場上發言，那末魏晉談士的「如心揣度，以決然否」（王充語）則可以說是更能代表個人的判斷與反省。不但如此，漢儒的批判往往著眼於客觀社會方面的種種事象，但於主觀方面所持的批判標準——所謂「道」——則視為天經地義，而不復置疑。魏晉清談由外轉內，批判的鋒銛有時竟直接指向「道」的本身。秦漢以來，知識階層所共同遵信的文化理想因此遂面臨着一次最嚴厲的挑戰。這是當時所謂名教與自然之爭的中心意義之所在。通過名教批判，中國思想史上出現了一個反傳統的新源頭，其影響之深遠是無可估計的。

本書所以名為《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因為所論斷自魏晉。但這裏「古代」一詞所表示的並不是任何嚴格的歷史分期，而是我個人的一點願望，即準備以後對魏晉以下多代續有所論而已。

余英時

一九八〇年八月廿日於臺北

目錄

自序

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一 近代有關「士」之起源諸說·····	四
二 「封建」秩序的解體與士階層的興起·····	一〇
三 士的文化淵源·····	二四
四 「哲學的突破」·····	三〇
五 「士志於道」——兼論「道」的中國特性·····	三八

六 君主禮賢下的「不治而議論」	五七
七 私門養客與游士的結局	七六
附錄	
審查報告一 許倬雲	九三
審查報告二 饒宗頤	九五
後記	一〇二

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

一 引言	一〇九
二 士人數量的激增	一一〇
三 士族的形成探源	一二二
四 王莽興亡與士族大姓的關係	一一八
五 兩漢之際起兵羣雄的社會背景	一二九
六 兩漢之際士族大姓的舉宗從征	一五一
七 宗族的武裝自保及其方式	一五九
八 親族之休戚相關	一六三
九 不重單身之士	一六五

十 光武集團與士族大姓的一般關係·····	一六六
十一 更始與赤眉敗亡之社會背景的分析·····	一七〇
十二 略論士族化程度與政治成敗的關聯·····	一七五
十三 從士大夫名稱之演變看東漢政權的社會背景·····	一七七
十四 結語·····	一八二
附錄一 兩漢之際各地豪傑起事表·····	一三一
附錄二 兩漢之際羣雄割據圖·····	一四〇
後記 畢漢思 (Hans Bielenstein) 「王莽亡於黃河 改道說」質疑·····	一八五

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引言·····	一〇五
一 士之羣體自覺·····	一〇六
二 士之個體自覺·····	一三一
三 漢晉之際新思潮之發展·····	一七五

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

一	何謂名教·····	三三〇
二	君臣關係的危機·····	三三二
三	家族倫理的危機·····	三三七
四	玄風南渡後的名教危機·····	三四六
五	情禮衝突——名教與自然之爭的延續·····	三五〇
六	「緣情制禮」·····	三五八
七	餘論·····	三六七

索引

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

知識階層的興起是中國古代社會演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追溯這一段歷史發展的過程之前，我們必須先對「知識階層」這個觀念加以檢討。

「知識階層」是西方近代的名詞，它最初源於俄國的所謂“*intelligentsia*”。至於現在英文中的“*intellectual*”這個字，則起源甚遲，據學者考證，它大概是由法國「老虎總理」克雷門梭（G. Clemenceau）在一八九八年首次使用的（*intellectuel*）¹。另一方面，俄國的“*intelligentsia*”

¹ J. P. Neill, “Ideas, Intellectuals, and Structures of Dissent,” in Phili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p. 95, note 45.

也是一個相當新的觀念，它出現於一八六〇年代中²。不過俄國「知識階層」的遠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貴族階級³。

由於「知識階層」的觀念起源很晚，以往一般的社會學家和史學家頗傾向於把這個社會階層認作一個近代的現象。他們當然並不否認，在近代以前的每一歷史階段中都存在着一個「知識階層」(intellectual stratum)。但是，據他們的分析，這種生活在近代以前的靜態社會中的知識階層，其功能與近代的動態社會中的知識份子截然不同。前者如古代印度的婆羅門或歐洲中古的僧侶，乃是壟斷當時教化權力的特殊階級，其主要的功能是在為當時流行的世界觀提供理論的根據，為當時的政治、社會秩序作辯護士。因此，這一階層在思想上是和日常的生活現實脫節的，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為自己的武斷思想作系統化的努力。歐洲中古的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便是這個階層思想的典型代表。

與此相反，近代的自由知識份子既不復具有壟斷教化的權力，因而也就不能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近代的知識份子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階級，他們已沒有一個組織嚴密的中古教會作後臺

² Michael Confino, "On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S. N. Eisenstadt and S. R. Graubard, *Intellectuals and Tradition*, Humanities Press, 1973, Part I, p. 117.

³ I. Berlin, "A Marvellous Decade, 1838-1848: The Birth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Encounter*, 4 (June, 1955); Richard Pip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Dacalus* (Summer, 1960); Marc Raeff, *Origins of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bility*, New York, 1966, "Introduction".

了。爲了爭取社會上各種不同的集團的支持，他們現在只有在學術思想的領域內從事於公平而自由的競爭⁴。

近代的知識階層與中古以及古代的知識階層，在性格上有顯著的不同，這是無可置疑的。但上面所刻劃的古今對比則未免略有簡化之嫌。所以最近已有社會學家從比較長遠的歷史過程中去分析知識份子的問題。知識份子並不是工業革命以後的新事物，每一個社會都有其知識階層，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識份子的問題⁵。而另一方面看，知識階級雖有中外古今之異，但未嘗不具備若干通性。以目前的研究業績來說，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特別是知識社會學家）的注意力依然是偏重在近代方面，尤其是近代西方的知識階層。因此對於通性方面，尙不能遽下「結論」⁶。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 by Louis Wirth and Edward Shils, New York: Harvest Books, 1936, pp. 10-13.

此處引者 Talcott Parsons ("The Intellectual: A Social Role Category") 及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對「知識份子」所作的理論方面的研究。兩文皆收入上引 Rieff 所編 *On Intellectuals*。

例如 Confino 所列舉的近代德國知識階層的五項特徵：一、深切地關懷一切有關公共利益之事；二、對於國家及一切公益之事，知識份子都視之爲他們個人的責任；三、傾向於把政治、社會問題視爲道德問題；四、有一種義務感，要不顧一切代價追求終極的邏輯結論(ultimate logical conclusions)；五、深信事物不合理，須努力加以改正。(上引文 p. 118.) 以上五特徵是研究德國知識階層之專家所共同承認的，其中第四項之求真精神，事實上乃是西方知識份子的一般特性；如 Karl Mannheim 謂德國特別有一種極端的傾向，把邏輯的論據推至其終極的結論。("a tendency to go to extremes in pushing logical arguments to their ultimate conclusions." 見 *Essays on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79. 按：此點乃 Confino 本人所指出，見原文註 2, p. 144.) 其餘四項則在以天下國家爲己任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身上都同樣找得到清楚的蹤跡。由此可見我們恐不易將知識階層嚴格地劃分爲傳統型與近代型，或西方型與中國型。關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並可參看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Limits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ity' as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亦收在 *Intellectuals and Tradition* 一書的 Part I 中。

在這種情形下，研究近代以前非西方社會的知識階層便更顯得是當務之急了。

一 近代有關「士」之起源諸說

知識階層在中國古代的名稱是「士」，但「士」卻不是一開始就可以被認作知識階層。「士」之變為知識階層，其間有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本文論知識階層的興起即在追溯這一過程。

近代研究「士」的起源問題的學者每好從文字訓詁下手，更喜引甲骨、金文為證。真所謂家異其說，令人無所適從。其較早者：徐中舒斷定士、王同字，皆象人端拱而坐，不過一為帝王，一為官長而已，其說頗受注目。劉節則謂「士」為西方之周所特有，即「卿士」與「太史」之官，日本學人亦有類似的見解。至於解「士」為周代官名之中，又可分祭祀官或理官兩派⁷。本文在取徑上不擬從訓詁的基礎上進行推測，因此對於「士」的初義的問題，存而不論。相反地，我們將以一項已知的事實作為討論的起點，即古代知識階層始於春秋、戰國之交的孔子時代。亞里斯多德早已指出，事物的本質須由其屬性（attributes）見之；對於歷史研究而言，這不失為一種比較可靠的辦法。

7

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一九三四），頁四四一—四四六，劉節「辨儒墨」收在他的《古史考存》中（香港太平書局，一九六三，特別是頁二〇—二二一）。日本學者河地重造「先秦時代「士」的諸問題」，《史林》第四二卷第五號（一九五九，九月）對近代論「士」的起源問題有較詳細的檢討，第一節即專論徐中舒之說。關於金文中「士」字之解說可看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一九七四）第一冊，「士」字條。頁三〇〇——三一〇。

但是我們在下文一開始時還是要徵引兩個訓詁的解釋。其中第一個是傳統的，第二個是最近新起而受到重視的。徵引的目的是爲了說明單靠訓詁不足以解決歷史的問題。本節其餘的部份則將介紹近代最流行的一個關於知識階層之起源的理論。

《說文解字》說：

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許慎以「事」訓「士」，自然是於古義有據。但若「事」字泛指一切之事，則我們仍無從知道「士」究竟是做什麼的。段注引《白虎通》「通古今，辨然否」之說，則祇可視爲漢代的通義，因爲劉向《說苑》也說：

辨然（疑脫「否」字），通古今之道，謂之士。

至於所謂「推十合一爲士」，大概也是漢人從《論語》「聞一知十」、「舉一反三」等說法中推衍出來的。無論是「通古今，辨然否」也好，或「推十合一」也好，都可以說是對於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性格方面的一種描寫。但是我們必須記得，這些描寫僅適用於已發展至定型階段的士，

8. 《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經韻樓本），一上，頁三九下—四〇上。《白虎通義》引「王制」之文見卷一「爵」篇，（萬有文庫，陳立疏證），頁一三。

9. 《說苑》（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卷十九「脩文」篇，頁八八。

而不是士的原始義。

近人吳承仕（檢齋）曾對《說文》「士，事也」的界說加以限定。他說：

士，古以稱男子，事謂耕作也。知事爲耕作者，《釋名》《釋言語》云：「事，傳也；傳，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漢書》《劇通傳》曰：「不敢事及於公之腹者。」李奇注曰：「東方人以物垂地中爲事。」事字又作菑。……《漢書》《溝洫志》注云：「菑亦垂也。」……蓋耕作始於立菑，所謂插物地中也。士事菑古音並同，男字从力，依形得義，士則以聲得義也。事今爲職事事業之義者，人生莫大於食，事莫重於耕，故垂物地中之事引申爲一切之事也。

楊樹達更據甲骨文加以補充道：

樹達按：士字甲文作，一象地，一象苗插入地中之形，檢齋之說與古文字形亦相吻合也。¹⁰

據吳、楊兩氏之說，則士最初是指農夫而言的。

但是這一原始意義的「士」恐怕是存在於非常古遠的時代。因爲就現存的古代文獻而言，一

10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中國科學院，一九五四），卷三「釋士」條，頁七二。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一九六二，上冊，頁六八）曾節引此文，認爲合乎「士」之原義，並舉《禮記》「少儀」篇：「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以證明士不脫農業生產。（按：所引《禮記》之文見卷十，頁一六上，四部備要本。）徐復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一九七二，頁八六—八八）亦節引「釋士」條，惟誤以吳承仕之說歸之楊樹達本人。